

现代汉语方位词“上、下”的认知语义探析

王惠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 对汉语方位词“上”和“下”的语义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分析大量语料, 探讨“上”、“下”在空间、时间、社会等级、心理状态等不同语义场中的延伸机制, 揭示其认知动因和概念隐喻基础。文章认为, “上、下”不仅体现了人类对空间经验的普遍性, 也反映了汉语使用者的文化观念和认知方式。

关键词: 方位词; 认知语言学; 空间隐喻; 概念延伸; “上”、“下”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方位词作为语言中基本的语义单位, 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系统中。汉语中的“上”和“下”不仅指称具体的空间位置, 还通过隐喻机制广泛用于时间、权力、情感等抽象领域, 体现出复杂的认知结构。尤其在现代汉语中, 这两个词语的语义已经高度抽象化, 构成了一个从空间经验出发, 向多个概念域延展的语义网络。

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日常交流中“上”“下”频繁出现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 作为主导关系和等级秩序的重要表达载体, 其语义认知潜力亟待系统性挖掘。语言不仅反映世界, 更构建世界。通过分析“上、下”的认知语义网络, 能够揭示汉语母语者如何在身体经验与文化图式之间建构意义, 进而拓展我们对语言认知功能的理解。

本文试图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 深入剖析“上”、“下”的语义演变与扩展机制, 以揭示其背后的认知动因。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将探讨其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使用特征, 最终反映语言、认知与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框架

本文主要依赖以下几个认知语言学理论: 1. 概念隐喻理论, 认为人类通过具体经验来理解抽象概念; 2. 图式理论, 特别关注空间图式在认知中的原型地位; 3. 原型范畴理论, 用于解释语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4. 认知语义网络理论, 用于揭示词义之间的结构化关系。此外, 还结合语法化理论, 用于分析“上”、“下”从实词到虚化词的演变路径。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语义分析与语料库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 通过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汉语语料库中心 CNC 等语料库系统收集以“上”、“下”为核心的词汇、短语与句式; 另一方面, 通过比喻映射与图式分析揭示其语义扩展路径与认知基础。此外, 本文也关注跨语言对比, 从英语、日语等语言里类似方位词的用法中, 探讨汉语“上”、“下”的特有文化认知。

三、“上、下”的认知语义分析

“上”最基本的空间义指高处、在……的上面。这一义项构成“上”语义网络的中心原型, 通过隐喻映射延伸至多个抽象领域:

1. 时间域: “上午”“上个月”, 指较早、靠前的时间;
2. 社会地位: “上级”“上层社会”, 体现权力与等级秩序;

3. 情绪评价：“上扬”“上进”，暗含积极、向上的心理态度；
4. 行为趋向：“上报”“上交”，表示信息或行动向权威方向移动。

此外，在视觉和听觉等感知活动中，“上”也常指代较强或显著的信号，如“声音上扬”、“视线向上移动”，这表明“上”在多模态语义中具有可感知性。在语言加工层面，这种上升运动往往与兴奋、扩展、自我强化等心理动因关联。这些扩展基于“高处为上”的图式认知结构，体现出人类认知中“高=好”的价值隐喻倾向。空间经验与文化评价在这里实现了有机结合。

“下”的基本义为低处、在……的下面，是“上”的反义词。其抽象语义路径主要包括：

1. 时间域：“下午”“下周”，指较晚、靠后的时间；
2. 社会地位：“下属”“下层人民”，表示服从、从属；
3. 情绪评价：“下滑”“下沉”，含有贬义与消极倾向；
4. 行为趋向：“下达”“下放”，表示自上而下的动作或指令。

更进一步，“下”还常出现在表示状态变化和结果递减的动词结构中，如“下降”“降低”，这些表达强化了“下”与能量减少、运动终止、系统退化等语义之间的关联^[1]。“下”同样体现了从空间图式到情感、社会秩序的隐喻机制，在许多语境中与“上”构成范畴对立，形成鲜明的认知张力。

四、“上、下”在多义结构中的互补功能

在语言实际使用中，“上、下”作为对立范畴构成了大量语言结构的基础。它们常成对出现，以构建对称结构，传达动态的方向性和层级秩序。“上下”搭配在语言中承载空间、时间、社会关系、逻辑结构等多维度的对立统一。

（一）空间结构中的互补性

最直观的体现是“上、下”在空间指示中的对立搭配，如“上楼/下楼”“上山/下山”，其含义直接指向物理位置的移动方向。此外，在建筑结构中，如“上层/下层”“上铺/下铺”，表达了明确的空间区隔。语言使用中借助这种物理对比来建立心理或社会等级印象，形成空间对称与逻辑秩序的映射^[2]。

（二）行为与动态过程中的配对使用

“上、下”作为动词或方向词参与构词，在动作性表达中展示明显的双向性。例如：“上报/下达”“上传/下载”“上线/下线”，体现出行为过程的始发点与终结点，也反映信息流动的方向。这种双向配对不仅构建逻辑清晰的语言单位，也使得信息组织与语言经济性大大提升。

（三）词汇构形与类义分化

“上、下”还经常参与复合词的构造，形成系统性的语义对立。如“上下班”“上下文”“上下游”“上下级”都体现出“上、下”作为界标的语义功能。这些词汇构成体现语言系统中以对立为基础的分类机制，有助于组织语义场与认知边界。例如“上下文”中，“上文”为语义预设，“下文”为解释补充，其组合结构反映了信息在时间与逻辑上的进展顺序。

（四）表意模糊与范畴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上、下”在一些语境中并非严格的对立关系，而呈现出互补或融合的趋势。例如“上下其手”表示合谋而非方向对立；“上下波动”体现状态变化而非具体位置。这种语义的模糊性是语言灵活性的体现，也是语义范畴逐步演化、融合的证据。

（五）情感与评价维度的双向性

在表达情绪或态度时，“上、下”也形成正负对立的语义场。“上扬、上进、升华”能体现积极取向；“下滑、下沉、堕落”则表达消极趋向。人类普遍经验将“上”与正面联结，“下”与负面关联，这种倾向广泛存在于文化隐喻与道德判断中。

五、“上、下”的对比与对称结构

作为核心对立词对，“上、下”在汉语中构建了丰富的对称结构，其应用从词汇层面延伸至句法结构和篇章组织层面，展现出语言与认知结构的高度一致性。

（一）对偶结构的构建

“上下”常用于对偶句式，如“上天入地”“上下求索”“上下同欲”。这些表达形式不仅体现出修辞对仗之美，也通过空间对立强调语义的张力。对偶作为汉语重要的修辞方式，与“上、下”天然的空间对立特性高度契合，使其成为构建平衡表达的重要工具。

（二）句法对称与逻辑推进

“上、下”参与句法结构时，常承担并列关系或递进逻辑的标记功能，如“由上至下地执行政策”“从下至上反映问题”。这种句法结构借助空间隐喻来组织信息，体现了中国人思维中“等级—顺序—功能”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明确主次关系与行文层级。

（三）篇章结构中的标识功能

在篇章组织中，“上文交代”“下文详述”反映出信息流的垂直安排。汉语书写的竖排习惯亦与此认知图式相契合。语言中“上段”“下段”“上下句”等指称手段，说明人类在处理书写文本时将空间经验用于逻辑层级的建构^[3]。“上”为起点、“下”为发展，形成篇章中的时间—逻辑流动路径。

（四）修辞运用中的文化特征

“上、下”广泛应用于成语与俗语中。如“上下其手”表达暗中操作之意；“上下交困”体现系统性危机；“上下嘴皮”用以形容唇舌不停，均是借用空间位置构建深层文化隐喻。这些表达展示出“上、下”不仅作为空间参考点存在，更承担文化经验编码的任务。

（五）哲学与政治话语中的对称结构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上下和谐”。政治话语中常见“上令下从”“上下有责”等表达，其语言结构体现出等级秩序与协调统一的政治理想。对称性语言结构不仅增强表达的权威性，也体现出社会组织中的控制与合作机制。

六、语义演变与文化认知

（一）语义演变机制的纵深考察

“上、下”作为汉语中的基本方位词，其语义演化路径并非单一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呈现出空间—抽象、具体—隐喻、实词—虚化等多层次、多方向的演变趋势。从最初的空间指示功能出发，这一对方位词逐步进入更为复杂的语法功能系统，并在过程中获得新的语义色彩和认知价值。

在语法化过程中，“上、下”经历了从具象空间名词向方向性介词、趋向补语乃至情态标记等语法范畴的转化。例如在“他走上楼”“她坐下了”中，“上”“下”已脱离纯粹的空间参照，转而参与句法结构，承担语义轻重更弱、但语法功能更强的角色。这一转化体现了语法化过程中常见的路径，即从实义词转向功能词，其核心机制包括语义抽象化、语义漂移与主观化。

Traugott (1989, 2003) 和 Heine 等人 (1991) 提出，在语法化中，词义常由客观空间经验向主观意图和语用功能转化。“下定决心”“下令”“上心”“上台阶”这类表达便展示了“上、下”如何超越空间领域，表达行为发起、心理趋向、情感态度等更高层次的意义。在“下令”中，“下”已经不表示方向性的动作，而成为权力执行与意志传达的隐喻标志，体现出语言中的“主观化趋势”。

此外，“上、下”还表现出概念重组与范畴扩张的语义演化机制。在表达如“上下求索”“上下波动”“上下游企业”中，“上下”已不再仅为单向的趋向标记，而是一种表示系统结构、过程状态或产业链关系的复合表达方式。这说明“上、下”已成为具有高度抽象能力的

认知单元，其演化不仅涉及单词义项的迁移，还包括整个语言系统中新结构、新概念的生成与固化。

（二）文化认知中的语义动因

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也深受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尊卑有序”为核心的等级观念，是“上、下”语义演化的重要文化背景。在封建社会的语境中，“上”普遍代表权力、地位、道德、神圣等正向价值，“下”则象征臣属、服从、民众、俗世等相对边缘的位置。这种文化内化的等级系统直接影响了“上、下”的语义搭配与词汇构成。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垂直秩序，在语言中具体表现为“上天”“上国”“君上”等结构。相应地，“下民”“下属”“下人”则形成语义上承载次级、从属地位的结构单位。例如“上天有好生之德”中的“上天”，不仅指自然之天，更蕴含神圣权威与终极道德判断的意涵；“下民易虐”则反映出将人民置于等级底层的意识结构。

这一语义动因在朝代更替、制度变迁中不断固化并被语言编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尽管“上尊下卑”的等级理念在形式上有所松动，但其语言影响仍广泛存在。例如在职场用语中，“上司”“上级”“上报”依然与权威、决策层关联，而“下达”“下属”“下放”则暗示执行、从属或权限转移。

道家文化对“上、下”的价值评判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具有反讽性和对等级结构的哲学超越。老子强调“处下”、“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在语言中形成一套柔性语义系统。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上”作为最高道德境界，却采用了“下”的方式去实现，即不争、不抢、不抗。这样的表述打破了传统的“上为尊、下为卑”的固有框架，赋予“下”以道义、力量、智慧等正向语义，这一对位系统为“下”在某些语境中的积极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认知动因与概念隐喻机制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上、下”的语义演化具有深刻的认知基础，特别是以身体经验为核心的空间图式与概念隐喻机制，构成了其意义迁移与扩展的认知动因。

Lakoff 与 Johnson (1980) 提出，诸如“MORE IS UP”“CONTROL IS UP”这类初级隐喻在语言中广泛存在，源自人类身体与环境互动的日常经验。在重力环境下，“上”意味着站立、成长、上升、接近光明，而“下”意味着倒下、坠落、死亡、黑暗。这些生理—心理图式被语言编码为隐喻结构，投射至情绪、社会、价值等非空间领域，构成“上=好”、“下=坏”的系统性隐喻关联^[4]。

在汉语中，这种隐喻投射极为丰富。“上进”“升职”“上等”“上品”“上策”无不体现积极、理想、成功的象征；而“下滑”“下流”“下降”“下台”则常带贬义、失败或退化的意味^[5]。即便在结构对称中，这种隐喻价值也不对称，如“上下其手”中尽管包含“上、下”，却整体带有贬义色彩，指不正当行为。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下”的认知图式不仅影响价值判断，也组织社会关系与情绪表达。例如，“上心”作为心理状态的表达，意味着注意力与情感的集中，强化了主观关注；“下狠心”则强调情感的分离与决断，体现认知能量的外放控制。这类表达说明“上、下”在认知过程中不仅扮演语义符号的角色，更成为人类思维建构的基本工具。

在语言使用中，这种隐喻与图式往往通过固定搭配、词汇习语、句式结构等方式稳定存在，构建出一个系统化的认知语义网络。例如，“上下班”“上下铺”“上下文”“上下游”不仅表达物理结构，更隐含制度安排、人际关系、事件流程等深层结构，这种语言单位的抽象性与系统性体现了人类如何通过语言将空间图式转化为社会认知与经验组织。

（四）语言相对论视角与文化认知方式

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结构对思维方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Sapir 与 Whorf 主张，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经验世界的组织框架。汉语中“上、下”的频繁使用与系统抽象，

便是一种认知偏好在语言中的体现，它不仅映射身体经验，也编码社会结构与价值秩序。

“上”与“权威”“规范”“中心”相连，而“下”则常与“从属”“边缘”“杂乱”关联。这种“方向性偏好”在语法结构中表现为信息焦点、事件重心的安排方式。例如“请上报材料”“文件已经下发”这样的表达中，“上”作为信息归集中心，“下”作为信息扩散终端，语言中的层级感强化了对世界秩序的垂直理解。

此外，“上下”作为元结构框架，常被用来组织文本逻辑与修辞策略。“上下文”不仅指句法结构中的前后关系，更引申为理解意义所依赖的语境网格；“上下联动”则表达多个主体或系统之间的层级合作模式。这些结构的广泛存在反映了语言结构对认知方式的深度影响。

从语言相对论出发，可以理解为何不同语言在表达“尊卑、等级、中心—边缘”关系时选择不同的图式资源。英语中多采用“high/low”“top/bottom”系统，但其语用习惯中对等级的凸显程度不如汉语系统化。在汉语中，“上、下”形成了一个贯穿空间、权力、心理、情绪、社会结构的多维符号系统，成为世界观建构的重要语义轴心。

综上所述，“上、下”的语义演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机制交织的过程，体现出空间经验、认知图式、文化价值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动态互动。作为汉语中极具代表性的方位词对，“上、下”不仅传递空间信息，更建构了汉语使用者关于等级、价值、行为、情感等多方面的认知框架。通过分析其演化路径，我们得以窥见语言如何在文化与认知交汇处发挥建构现实的功能，从而深化对语言—思维—文化关系的整体理解。

七、结语

“上、下”作为汉语中极具代表性的方位词，其语义不仅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空间认知经验，也融合了汉语独特的文化意识和认知方式。通过对“上、下”语义结构和认知机制的深入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 [1] 高原, 吴长安. 汉语方位词“下”的空间关系构式认知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45(01): 141-145
- [2] 蔡永强. 从方位词“上/下”看认知域刻划的三组构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 (02): 47-54
- [3] 赵亚男, 符史涵. “上/下”的不对称性及认知分析[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8(02): 130-137
- [4] 周统权. “上”与“下”不对称的认知研究[J]. 语言科学, 2003, (01): 39-50
- [5] 缙瑞隆. 方位词“上”“下”的语义认知基础与对外汉语教学[J]. 语言文字应用, 2004, (04): 69-75

A Cognitive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Modern Chinese Directional Terms “shang” and “xia”

Wang Hui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s of the Chinese directional terms “shang” and “xia”.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extensive corpora, it explores the extension mechanisms of “shang” and “xia” across different semantic domains—including spatial, temporal, social hierarchy,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revealing their cognitive drivers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foundations. The study argues that “shang” and “xia” not only embody humanity's universal spatial experience but also reflect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cognitive patterns of Chinese speakers.

Keywords: directional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spatial metaphor; semantic extension; “shang” and “xia”